



# 再现初唐文化的碑刻妙品



□ 马彦如 张剑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东汉末年，由留侯张良八世孙张道陵创立。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代，道教被唐高祖李渊定为国教，从而成为与佛教并行的宗教派别。

因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教主老子李耳也姓李，道教在唐代得到唐王朝的扶持和崇奉。依托姓氏附会，唐代更加提倡道教，信奉者颇多。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建宫供奉，长安曰“太清”，洛阳曰“太微”，诸郡曰“紫极”。润州著名的“元妙观”，即为唐代紫极宫老子祠，在石达桥西北（今镇江市贺家弄一带）。此外，在丹徒区团山南侧的马墅村，有仁静观，为南朝刘宋元嘉初（424年前后）创置。

收藏于镇江焦山碑林博物馆的“魏法师碑”是镇江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唐初碑刻，也是研究镇江道教历史以及唐代政治与道教关系的重要文物。“魏法师碑”全称“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立于仪凤二年（677年）十一月十五日，碑文记载了魏降法师的生平事迹。该碑螭首龟趺，高2.42米，宽0.87米，碑脊圆肩，四螭缠结，题额篆书“魏法师碑”。由唐中书右史兼崇文馆学士安定胡楚宾撰文，清河张德言书，东海徐秀昉镌，石匠满通凿造。

魏降，字道崇，任城（即今山东济宁）人。生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卒于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六月六日，享年82岁，于六月十三日安厝于仁静观西南之马迹山。

道家把精通道法，能养生教化，为人师表者称为法师。碑文中记载，魏降法师自幼即仰慕道教，“甫及冠年”即拜茅山徐法师为师，贞观九年（635年）被召，随师入京，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并“由是蒙度出家，配居谁山之仁静观”。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他受诏在道教圣地茅山“修福精湮茂典”，成为道门领袖式人物。在兴佛排道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天后（武则天）又降殊恩，赐他一件饰有珠宝的山水纳帔。魏法师与皇朝的关系之密，可见一斑。地方官吏争相与之交往，如润州刺史范阳公卢承庆，武涉公李厚德，以及“驸马都尉乔师望”等皆“闻风致礼，披云投谒”，足以证明，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名望及道教界的地位显赫一时。

“魏法师碑”碑文为观察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士族在乡里的生存境况以及基层社会的秩序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碑主魏法师出身汉晋名族任城魏氏，其家族在西晋末南渡，以侨姓低级士族的身份长期活跃于京口一带。利用家族秉持的道教信仰传统，他们又成为地域性宗教领袖。

“魏法师碑”碑阴人名第八为“守润州谁山戍主解建威”。唐承隋制，在诸镇军下，建诸戍以屯兵守境。唐史所载润州驻军设置较晚，仅见“至德二年（757年）以润州之江宁县置，有江宁军，乾元二年（759年）置有石头镇兵，有下蜀、谁山二戍”，并未提及“谁山戍”。而碑阴上留下的“谁山戍”的记载，表明这里唐初就成了扼守润州的江防要塞之一，既是研究古润州军事设防可贵的资料，也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千余年来，“魏法师碑”一直被保存在镇江大港华阳观（宋政和年间改仁静观为华阳观）内，1961年春，因筹建焦山碑林，遂将此碑集中于焦山收藏。“碑文之谁山，即今之团山”，这是近代镇江考古学者陈庆年在所撰的《横山草堂类稿》中考证所得结论，“仁静观，刘宋元嘉初置，碑云谁山之仁静观当是元嘉时即以观所在之地名曰谁山。唐以前作谁山，宋以来作团山，其音可以相通”。

专家推断认为，碑文与碑阴所见诸多人名，大多也应是东晋以降迁徙、定居于京口的侨民后裔，及至唐初，多已完成土著化。长期以来，侨姓士族以信仰与婚姻为媒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主导着地方社会秩序。历经王朝鼎革、政区废置等，江南地域社会内部，人群结构与人际结合的样态均呈现出延续性的一面。碑文内容同时亦蕴含了唐初润州大量的自然、社会信息，生动地印证了隋唐之际社会动乱到平定的历史，反映了道教对唐初君主特别是太宗李世民的巨大影响及茅山对周边的辐射力，对研究镇江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问道茅山三千年》⑥

□ 张春蕾 夏和生

### 茅山道教之隋唐北宋时期（下）

#### 3. 北宋道教持续发展

北宋（960~1127年）时期，共历9位皇帝，享国16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代之后继续尊崇道教的朝代。虽然从总体上来说，相比于唐朝，北宋时期的茅山上清派道教的发展势头缓了许多，但有些时期，特别是宋真宗与徽宗在位时期，道教几乎成了国教，茅山道教获得了无比的殊荣与恩遇。

在整个北宋王朝期间，皇室对宗师们十分尊崇，常召请问道，赐给钱财衣物，在茅山等地为其敕建宫观，从而使上清派名声远播，广传于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之中，徒众遍及全国，道馆仙坛遍布各大名山。

北宋期间有茅山、龙虎山和阁皂山三大道教名山，但就道派而言，茅山的势力仍居首位，其组织严密、传系清晰、高道众多，与统治者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这一时期，茅山宗的传系为第二十代至第二十七代宗师，比较著名的有：第二十三代朱自英、第二十五代刘混康等。

朱自英（976~1029年）是茅山上清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三代宗师，句容本地人。12岁到茅山紫阳观出家学道，29岁嗣教。如此年轻，就成为宗师，这在茅山道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前22代的宗师称号，都是师徒授受的，在某道士坐上宗师席后，再仿照张天师世家的先例而追加认定。而钟国发先生认为，朱自英可能是自封的宗师（《茅山道教上清宗》）。他当家不久，就因为宋真宗求子成功而迅速与皇室拉上了关系，将茅山道教总部紫阳观改名为“玉晨观”，太平观改名为“崇禧观”。刘皇后决定皈依道教后，遥尊朱自英为度师，举行了隆重的受上清篆仪式。作为报答，皇后资助朱自英在陶弘景“郁岗斋室”故址建造“集虚庵”，不久改名为“乾元观”。《道藏》6卷本《上清大洞真经》正文前有朱自英的序。可惜朱自英在世时间较短，53岁就仙逝了。

刘混康（1036~1108年）是北宋时期茅山上清派的又一个关键人物。由于他医道高明，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据说王安石病重时，其夫人吴氏特地令人到茅山问病于刘混康。刘混康为孟皇后服符取针后，名气更大了。宋哲宗赐给他“洞元通妙法师”的称号，命他担任京师“上清诸贤宫”住持。

更为重要的是，茅山宗坛的地位因刘混康而立。据《茅山志》本传，绍圣四年（1097年）宋哲宗敕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将刘混康修道的“潜神庵”改建为大型宫观，赐名“元符观”，又“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筑宗坛，与信州龙虎山、临江军阁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这是赵宋朝廷以敕令的形式正式认定道教中的主流派的正统地位。同时，由于宗坛地位得到朝廷确认，茅山宗的组织体制也就完全稳定了，茅山宗位居三大主流道派之首。

宋徽宗继位后，敕令扩建“元符观”为“元符万宁宫”，并赐刘混康九老仙都君玉印、玉剑，又亲书《度人经》《清静经》《六甲神符》赐之。刘混康仙逝后，徽宗追赠为“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太中大夫”。“三茅崇奉之严，未有盛于斯时也”。

除上述这些宗师外，北宋时期还有不少茅山道士在当时十分著名，诸如张绍英、武抱一、王釜、汤用明、沈若济、冯太申、陈希微、汤友成、杨希真、黄澄等，真是高道辈出，显示出茅山宗的实力之强。

所以，如果要问隋唐时期影响最大的道派是哪一家，答案无疑是——茅山上清派。它是隋唐至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道派，无论是从宗门传承或学术贡献来看，成就都是最高的。唐代最显要的道士多来自茅山宗，当时有“茅山为天下道学所宗”之誉。这一时期，道教南北派继续交往、交流、交融，但上清派（茅山宗）始终处于主流的地位。该派很多宗师大德都是道教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或著书立说论述自己的教理教义，或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们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与养生学等方面都做出了独特贡献。

隋唐北宋时期，即使从宫观庙宇的建设规模上来说，也是茅山上清派的全盛之时。该时期宫观庵院达到250多处，房屋5000多间。宫、观、庙、宇、馆、殿、堂、亭、台、楼、阁、坛、精舍遍布前山后岭、峰巅峪间。茅庵、道院、丹井、书院、桥梁等各种大小设施尽显“第一福地”风采，尽享“梁唐宰相家”之美称。

唐宋之际，茅山道教社会影响之大，从茅山周围一些村庄名称都可以看出，这些村庄取的名字都与道教相关联，如望仙乡、承仙乡、福祚乡、行香乡、降真桥、玉真、茅庄、高庙，等等。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